
节日与抗战：以战时重庆春节 为中心的历史审视

汪浩 周勇¹

（西南大学）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传统的中国春节打上了战争烙印。中国人民在战争阴霾中度过了八个农历新年。重庆是战时国民政府驻地，春节时期，重庆人民节日不忘抗战，积极组织和实施了劳军献金、节约过节等活动。战时的春节成为陪都民众战时动员的关键节点。春节期间重庆组织的劳军献金、节俭过节等活动有利于支援抗战。

【关键词】：抗战时期 春节 重庆 战争动员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国人民团圆、祈福、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诸多愿望。当春节遇上战争，传统的节日氛围深深打上了战争烙印。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传统春节便笼罩在战争阴霾中。对于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如何度过春节，学界多有探讨，现有成果以战时抗日根据地的春节研究最为丰富，如由俊勇《春节下的“救亡”：抗日战争场域下春节动员的历史考察》一文认为，中共在根据地利用春节进行社会动员，取得了积极影响，其效能大于国民党的春节动员^①；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春节文化风貌》^②、韩晓莉《革命与节日——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节日文化建设》^③、李军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娱述评》^④等三篇论文从不同视角分析和探讨了战争给根据地人民春节带来的影响以及民众对战争的因应。

遗憾的是，学界少有研究战时大后方人民如何过春节的著述。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政府机关与避战民众纷纷迁入西南西北等地，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大后方人民如何度过传统春节，同样值得研究和探讨。其原因有三点：一是重庆为战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是战时中国的抗战中枢，国民政府如何组织民众度过战火下传统春节值得呈现；二是战时大后方的很多民众来自沦陷区，对于安土重迁而又饱受战乱之苦的战时移民来说，异地节日感受理应值得梳理；三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主题，在陪都重庆，人们利用春节节点开展了劳军献金、节俭过节等活动支援抗战，其精神值得弘扬。本文将重点阐述战争对中国人传统春节的影响，揭示日本侵华是造成战时中国人民苦难与不幸的根源；同时探讨大后方人民如何利用春节进行战时动员，书写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团结自强的抗战精神以及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希望与追求。

一、战争阴霾下的中国“春节”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但以制度形式确认“春节”为农历新年始于民国初期。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即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对中国传统的农历纪年法予以改革。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批准了订立“阴历元旦”为“春节”的呈文：“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①自此以后，从法律意义上春节正式成为中国人的节日之一。

¹本文系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抗战工程一般项目“战时重庆的贡献与地位”（项目号：2017YBKZ04）的阶段性成果；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海外抗战大后方档案、文献、影像史料整理研究”（项目号：2016-ZDZX01）的阶段性成果。

由于北洋政府大力推行阳历纪年，春节及其他旧历节日日益冷落。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颁布了多条政令禁止民众沿用传统旧历习俗，甚至取消春节假期，试图以行政手段废除旧历，但传统的旧历习俗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规律，旧历节日仍然受到广大民众认可，“这种旧的习惯又已深入人心，决不是什么奇术和一纸行政法令所能勉强废除的。”⁽²⁾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简单、粗暴地利用行政手段废除旧历的做法并没有完全得到执行，一直到全面抗战时期，人们仍习惯于旧历新年。

1940年除夕，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感叹传统春节习俗根深蒂固：“今日(1940年2月7日)为旧历除夕。不仅市面显有过年的样子，即各机关亦然。移风易俗之难如此。”⁽³⁾1941年1月27日大年初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记载了春节比阳历元旦更有过年氛围：“午间抱小孩者颇多，随处可见有新气象，一般衣着及其门前较洁整……民国建立以来，阳历年节百般提倡，人民终鲜注重。”⁽⁴⁾所以尽管国民政府百般提倡阳历新年，老百姓仍然更愿意过旧历春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已然不可能享受到传统春节团圆祥和的氛围了。即使在春节期间中国人也会受到日军战火的侵袭，很多家庭不得不远离家园，奔赴他乡。1937年底，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入重庆办公，先行迁入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人就在重庆度过了1938年的春节(1月31日)，这也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在战火中度过的第一个春节。这个春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一个万家团圆的“好日子”，而是一个战云密布、流亡他乡的逃难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华北、华东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先后失守。即使在春节期间，沦陷区的人民也深陷在战争的恐慌中。

《泰晤士报》报道了沦陷后的上海春节状况：“昨天本埠庆祝本年最重要的放假日……昨天沉闷阴暗的天气，必定和多数人民心里凄悲的情绪密切吻合。”字里行间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战争遭遇的同情，“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经历过这种磨折，像现在人民正在经历的”。⁽⁵⁾多数民众因为战争被迫离开家园，在异地他乡度过了传统的春节。画家丰子恺之女丰一吟难以忘怀1938年春节期间举家逃难的情景：“我们1938年的春节就在萍乡度过，这也是我们流亡中的第一个春节。”⁽⁶⁾面对紧迫的战事以及沦陷区民众的悲惨遭遇，1938年的除夕之夜，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国土沦陷、生灵涂炭深感自责：“谈及江南水深火热之惨状，自问何以救民报国也。”⁽⁷⁾整体上来看，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个春节，由于战争的突然性、残酷性和不可预测性，枪炮声与死亡的阴影代替了喜庆的鞭炮声和欢笑声，逃难流亡代替了传统中国家庭的团圆和天伦之乐。

1939年2月19日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个农历春节，但战争也进入到极其残酷的阶段，日军不仅在春节期间肆虐侵占中国国土，还对中国大后方多地实施了无差别轰炸。如1939年春节前夕，日军进逼海南岛，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对海南文昌、定安、崖县、陵水多地实施轰炸，当地居民不得不离家避难。⁽¹⁾该年春节期间，日军战机还侵入大后方实施了无差别轰炸。1939年2月20日，日军30架战机入侵兰州上空进行轰炸；随后入侵宁夏的日军战机还造成了几百人伤亡的骇人事件。⁽²⁾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春节期间亦有大批难民疲于奔波。1939年春节前后，先后经历了五次搬迁的同济大学师生，才分期分批从广西迁入昆明，重新组织教学工作。⁽³⁾对于国土的沦陷、民众的流离失所以及凄凉的节日氛围，除夕之夜的蒋介石甚为伤感：“今日为旧历除夕，同胞多流离失所，何以报之？余尤饱食暖衣，忝为全国领袖，何能自慰？光阴如矢，悲乐互生，回忆幼年在家庭度岁，围叙天伦之乐事，而今则兄妹俱亡矣，痛哉。”⁽⁴⁾

1940年的春节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三个春节，在此期间，仍有不少城市和农村被日军侵占。1940年1月22日，日军乘漫天大雪偷渡钱塘江，侵入萧山县城，半个月后中国进入到传统的新春佳节(1940年2月8日)，萧山民众在日军枪炮之下过年。桂南会战也发生在1940年春节时期，战事结束时间恰好在春节当天。中国军队苦战多日，付出的伤亡极大，最终的失利也让人揪心不已。

1941年1月27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四个春节，春节前两天，豫南会战爆发。豫南会战贯穿了1941年的整个春节，一直持续到2月10日结束。日军所到之处，中国家庭往往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流亡逃难，再也无法在美好的节日安享天伦之乐。1941年除夕之夜，蒋介石记载了孤居异地的悲伤，“本日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的，恐抵此一人耳。”⁽⁵⁾国民政府领袖的除夕之夜尚且如此孤单，更遑论战时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苦难与艰辛了。

1942 春节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来说算是一个略感欣慰的节日。重庆璧山县民众用春联表达了这个节日的欣喜，“正义著先声，四年孤战，终致召怀英美，旌旗直捣三岛地；独行依古道，十载宦游，才得抖擞精神，昼夜试读五车书。”^⑥其主要原因是 1941 年 12 月 7 日清晨，日本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许多国家也因此转变立场，对日宣战，孤军作战的中国看到了希望。

1945 年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年，但因 1944 年豫湘桂战事的失败，给这年的春节蒙上了阴影。1944 年 4 月至 12 月，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连续组织了豫中、长衡、桂柳会战，史称豫湘桂会战，然而战事的结果是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会战中溃败，日军一举占领洛阳、衡阳、桂林，12 月初，日军甚至攻占了贵州独山及八寨，陪都重庆危在旦夕，国际社会对中国战局极度失望。蒋介石总结了会战失利的危害，“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

敌人侵豫犯湘，窜扰桂柳，猖獗盲进，在最深入的时候，侵犯到了贵州境内的独山。”^⑦他甚至认为豫湘桂大溃败导致国家“有甚于危亡之可能者”。除夕之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旧历甲申年之大除夕，亦为旧年最后之一日。依甲申之岁，在三百年前明代崇祯帝殉国于北京，亦为清定都北京之岁。国人对此岁多具戒心，认此岁多为不祥之年。余默察世界大势与中华国运，并不以此介意……自信中华民族绝不至由余而亡……。然而在此甲申一年中，国家陆危与国人困厄，实觉为生平所未有之经历，其间形势险恶，有甚于危亡之可能者，今幸获上帝护佑，勉强撑持度此年关，惟愿乙酉岁（1945 年）乃我转败为胜之年也。”^⑧在除夕之夜总结过往一年，展望新年事业，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蒋介石本人在除夕当天以历史上“甲申”“乙酉”年的成败来“占卜”抗战前途，说明春节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和平年代的人们在春节期间或许祈愿生活安康、幸福与吉祥；但战争年代的春节，饱受苦难和不幸的中国人唯一的祈愿也许就是战争尽快结束，和平早日到来。

二、战时重庆民众的春节实态

燃放鞭炮焰火是中国人民庆祝春节的主要形式，反映了人们渴望安泰祈福平安的愿望。但对于风雨飘摇的战时中国来说，人们已无心燃放鞭炮留恋焰火。在战时首都重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战时移民反而在春节来临之时更加担忧家乡亲人安危，挂念被日军侵占的家园。离开家园流亡他乡，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是不得已的事情。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回忆了战时被迫逃离老宅、流亡他乡的状况，“就这样，我们扶老携幼，离开了祖父母，离开了老宅，离开了芜湖，颠沛往西而去。”^⑨年幼之时被迫逃离家园时，章开沅先生深深体会了战争带给中国人的伤害：“国破家亡，生离死别，仿佛永远定格在这间房里。”^⑩

抗战时期，将近有 300 万外省人口迁入川渝两地，大致占了当时四川省人口的 6%。据统计，1937 年重庆全市人口为 473904 人，到 1946 年则达 1245645 人，8 年间增加了 2.6 倍。^⑪这些战争中失去家园庇护的人们，心中积淀的家园意识更加强烈，在节日时分思乡之情更为浓重，“梦里家书随岁尽，愁中画鬓与年深。”^⑫老舍先生在春节时想起了家人和北平的年味儿，“抗战中，我的家属留在北平。我自己在武汉，在陪都，随着人家庆贺年节，可是我的心却在北平。”“在武汉与陪都过年，都没有大雪，我渴望那带着雪帽的青松，与垂着冰箸的水车，我不能不感谢武汉与陪都，它们教我在困苦流离中还能拿着我的笔，写一些我自信能教大家得到一点点愉快的文章。可是，我也想北平。”^⑬张恨水想念战前“过年”的幸福场景，“加以断续炮竹声，城南北远近相应，年味盎然也。”而战时重庆的新年则显得清苦凄冷，“饭后守岁小坐，与南回首旧事，一语三叹，人犹此人，雪犹此雪，除夕犹此除夕，非其地，非其时矣。

谷中无爆竹声，取旧表视之，仅十句钟，而万级均寂，宇宙若死，探首户外，漆黑无光，伸手不见其掌。”^⑭1940 年春节，在重庆过年的陈克文触景生情，油然而生思乡之情：“一位同学历举最近三年旧历除夕的往事相告，深深慨叹异地作客，思乡忆家，倍切情思。”^⑮国民党党史研究会编纂林一厂节日期间担忧亲人安危，“近阅报纸，梅县形势极危。想今年各乡民不能循例度岁矣。”^⑯蒋介石也无法摆脱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余自十九岁在家中度岁以后，至今卅四年间，未得在家团圆度岁。当年团叙天伦，今则虽欲得而不可得矣”^⑰从这些战时留存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战争年代中国人过年的境况。战争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和平安宁，将中国人春节全家团圆的美好愿望撕裂成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血腥现实。

战争还造成了中国物资匮乏，民众生活极度贫困，通货膨胀就像“白血病患者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通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¹⁾据统计，1945年重庆的主要商品价格的物价指数比1937年初提升了1560多倍。⁽²⁾在传统的春节，中国人总要拿出辛苦了一年的积蓄，张灯结彩、杀鸡宰猪，以图让家人享受新年的快乐。但战时物资极度匮乏，使得广大民众即使在春节期间也无法过上一个热闹而又丰盛的节日。

陈克文记载了1940年春节的萧条：“昨夜爆竹的声音很少，今晨也十分寥落，还是比不上以前的景况。”⁽³⁾畸高的物价使得一些贫困百姓难以承受生活重负，以致酿成了不少悲剧。1941年2月5日，复旦大学教授洪深在春节之后举家服毒自杀。从社会角度看，自杀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战争造成生活困境可以说是诱发自杀等悲剧产生的因素之一。为了抗战事业，中国人民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军事备战之中，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即使在阖家团圆的新春佳节也无法改善家人生活，轻生的悲剧由此产生，“战事所给他们的物质的压迫——衣、食、住、行的苦难——已达到极点，正是日暮途穷的时候，倒不如谢绝这个世界以免在人间活受罪。”⁽⁴⁾

尽管物质匮乏，但邀上亲人或朋友，并尽其所能地准备一顿“年夜饭”是战时民众表达春节祝福的主要方式。1940年，胡风迎来了他在重庆的第二个春节，胡风凑齐了一点腊肉、香肠等做成了战时的“年夜饭”，对于这样的“年夜饭”，胡风已经甚为满意；⁽⁵⁾1942年春节，董必武则是与驻渝的中共南方局人员一起以“团年饭”形式度过了这一传统佳节。亲人朋友在春节期间能够短暂的团圆，对于国破家亡、命悬一线的中国人来说已是最大的欣慰了。

当然，战时重庆民众并没有因物质匮乏和春节的萧条而忘记正在进行的抗战，民众在固有的庆祝仪式中赋予了抗战元素。战时重庆春节期间，出现了不少彰显抗战主题的春联。如“驱逐倭寇，还我河山”“大丈夫献身卫国，好男儿壮志凌云”“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回争取民族生存”等等。⁽⁶⁾各家张贴的年画门神也寄托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希望，传统门神由秦叔宝、关云长等神话人物转换成一位位英勇杀敌的抗日将士，艺术家们将中国旧有的木刻艺术灌输了抗战元素，以此激发民众抗战信心。⁽⁷⁾

三、春节期间的抗战动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春节也不仅仅是传统节日，而被赋予了抗战动员的时代意义。春节期间，国民政府组织了抗战动员、劳军献金等活动。与之呼应，广大民众积极参与，他们用仅有的物质和不屈精神支持了这场民族存亡之战。

为了鼓舞民众抗战士气，国民政府利用春节组织庆祝活动，希望调动民众热情，积极参与抗战。如1943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分别与英国、美国签订了《中英新约》与《中美新约》。消息传到重庆，全城欢腾，国民政府也破例规定该年春节放假3天，一则庆祝新春佳节，二则利用春节节点来庆祝中英、中美新约的签订，以鼓舞民众、凝聚人心。王世杰记述了这一例外的春节假期，“今晨为旧历元旦，亦为立春日。政府自今日起放假三日，以纪念不平等条约之废除。”⁽⁸⁾春节当天，陪都各机关团体、学校还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模范广场举行了中英、中美签订新约的盛大游行庆祝大会。

春节期间，国民政府更多组织了重庆各界进行劳军献金活动。全国慰劳总会利用春节发动民众，举办春礼运动、慰劳空军、募捐劳军等多种多样活动，藉以筹措资金，凝聚抗战民心，慰劳前线战士。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劳军活动影响最大。1940年春节期间，全国慰劳总会决定发起春礼劳军运动。1月10日全国慰劳总会在重庆成立春礼劳军筹备委员会，同时致电各省市县党部：“春节将到，一般同胞因积习已深，颇多无谓消费，举办春礼劳军运动期使全国同胞转移馈赠之对象。”⁽¹⁾慰劳对象为“前方将士，负伤将士，壮丁新兵，及征军人家属，藉以加强抗战情绪。”⁽²⁾春礼劳军开幕大会于2月10日在川东师范体育场内举行，重庆各机关团体组织了200多支献礼队到场参加，当天的献礼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才结束，共收到礼金60余万元。《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都对春礼劳军运动给予高度评价。

《大公报》认为“征衣募药，是在物质上减少战士的痛苦；春礼劳军，是在精神上增加战士的愉快。”发出呼吁：“同胞们，送礼吧！这是我们对战士的感谢，也是对战士的鼓励。”⁽³⁾《新华日报》把春礼劳军运动与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紧密结合，“春

礼劳军,不是个单纯的慰劳工作,而应该把它推进为一个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广泛的群众运动。”⁽⁴⁾这一年的春节劳军运动参与范围广泛,成果显著,影响深远,“为以后数年的劳军运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⁵⁾此后,劳军春礼运动每年春节都有举行,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春节期间的抗战献金活动也在重庆、四川等大后方各地进行。1939年春节,重庆各界开展了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各业节约献金,几乎当时重庆所有的工商行业参加了献金活动。⁽⁶⁾献金场面感人,“一面‘擦皮鞋献金’的旗子,贴满花花的钞票,异军突起的出现,那是黄瑞纶、五安纶三天内给人家擦皮鞋的义卖献金,一共二十三元六角”;《新华日报》也献出了所有同人全天200元的收入。⁽⁷⁾1940年春节期间,重庆各界掀起了春节献金高潮。献金期间,全市数十万群众和郊区农民纷纷响应,不少难民、孤儿院儿童、乞丐、伤兵和小商贩都献出了财物。儿童的捐助行为最有感染力,“他们一共七个,用小手献出了他们的零食钱”,“在都邮街一个照相馆的小主人被父亲抱到台上,送了一百元钱,另一个小朋友手裏握着三块钱,也投进了送礼台。”黄包车夫也将辛苦所得捐出,其中一个黄包车夫连捐了几次,他说:“我没有钱,我就决定出半天的力来献金,我拉好多就送上好多,拉到哪个礼台就送到哪个礼台。”⁽⁸⁾1941年春节期间,重庆还开展了劳军献金活动竞赛。慰劳总会制定了《出钱劳军竞赛办法》,规定自2月10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出钱劳军竞赛运动,竞赛方式多样,有团体相互竞赛,各业之间、同业之间相互竞赛,个人之间也要相互竞赛。⁽⁹⁾

春节期间也是动员全民节约行动的重要节点。为了应对战时物资消耗,国民政府利用春节节点实施全民动员,提倡节约行动。1938年1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节费集捐请从春节起”的社论,号召“一切热心的爱国同胞,更应当减免各种浪费……竭力节省、集捐、输金,贡献给国家,贡献给抗战,使春节节费集捐运动不断地继续下去,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一直到建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为止。”⁽¹⁾1938年9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九十五次会议通过了《节约运动大纲》,提倡节约是为增加抗战物资,充实建国力量,养成国民风气。1942年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新年及春节节约实施办法》训令,希望新旧历年节无论官民机关皆应实行节约,禁绝送礼及宴客等无谓浪费。⁽²⁾1944年春节来临之际,国民政府开展了勤俭节约宣传教育活动,从该年春节前夕的宣传布告可以略窥一斑:

(一)庆祝新年,除中央党政最高机关外,不得搭制牌楼或张灯结彩;

(二)商店不得发售年节礼品;

(三)禁止宴会、送礼、贿财;

(四)禁用贺年片,禁刊贺年广告;

(五)严禁赌博及类似赌博娱乐营业;

(六)节约水电,新年及春节前后,商店在十时前闭市。⁽³⁾

战时生活励进会是实施春节节约行动的组织者。1943年春节期间,战时生活励进会在陪都重庆广泛推行春节节约行动。首先,为使人们了解春节节约的重要意义,聘请名人代为广播宣传,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及邵力子等参与广播宣传。战时生活励进会还发动童子军进行口头宣传,3000名童子军共计劝导中西餐店、旅馆、食品商店等2650余家。第二,绘制春节节约幻灯片及制印标语,在重庆各电影院播放幻灯片,在大小西餐店、糖果店及礼品商店等张贴刊出,在市内公共场所及通衢要道广为张贴,并在各电影院散发。同时该会编印了《为春节节约敬告重庆市民书》:

重庆市同胞们:

一年容易,又是春节到来了……这时候,大家将要忙着馈赠礼品、宴会亲朋,藉以彼此庆贺,互相联欢。本来这也是人情之常,

不过,现在正是国家民族争取独立生存抗战时候,我们试想一下,在前方杀敌的将士,为着国家民族,不惜牺牲性命在战斗,我们难道忍心在这时候为个己、为私人的应酬交际而作无畏的浪费,以来刺激物价的上涨吗?不,我们要厉行节约,停止馈赠礼品,宴会亲朋,以及其他各种无谓的消耗。

亲爱的本市同胞们……我们在陪都的国民,举凡一举一动,一饮一食,不但为全国所重视,亦为国际所注目,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谨慎,严守国家的法令,力行简朴严肃的生活,造成优良的风气,为其他各省市的倡导。

回首过去,我们的情绪,不够紧张,我们的生活,不够严肃,我们要趁此新春,立新志愿,造成新风气,切实实行战时生活,以迎接最后的胜利!⁽⁴⁾

春节期间的劳军献金、节约活动一方面可以短时间内集聚大量捐助,充实了抗战物资,如1938年1月,重庆市民捐募寒衣款达20多万元、军鞋10万双、棉背心4万余件,重庆被服厂还赶制了30万件棉衣;⁽⁵⁾另一方面抗战动员与庆祝春节结合,民众的注意力更易聚焦,引发共鸣,从而坚定民众的抗战信念,推动抗战事业发展。

四、结语

古往今来,战争毁灭生命、财产,制造灾难、不幸、悲剧。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在战争的阴霾中度过了八个春节,阖家幸福的节日变成苦难不幸的“春劫”。面对国家生死存亡,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团结自强,传统的春节也成为中国人民战时动员支援抗战的关键节点。春节期间,陪都重庆积极开展劳军献金和节俭过节活动,以激扬的斗志挽国家民族于危难,时人认为“尽管环境满布着黑暗,而岁序仍然是纯洁的新的”,⁽¹⁾也正如美国记者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所云:“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²⁾

随着时间流逝,伟大的抗日战争诸多历史细节日渐淡出人们视线,今天的人们正享受着每一个节日的祥和幸福,但战争造成的苦难和不幸以及造成这种苦难和不幸的根源我们不能忘记。强调不忘历史,铭记战争造成的痛苦、流离与不幸,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超越偏激与狭隘,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当代世界,局部战争仍然频发,世界大战的阴霾也并未完全散去;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妄图复活,将亚洲和世界再次引向战争和灾难。我们在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时,更需要在历史进程中反思如何制止战争的发生,从而诗意地度过每一个幸福安康的节日。

注释:

1 由俊勇:《春节下的“救亡”:抗日战争场域下春节动员的历史考察》,《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2 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春节文化风貌》,《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3 韩晓莉:《革命与节日——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节日文化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

4 李军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娱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

5 《四时佳节之新规定》,《申报》1914年1月30日,第6版。

6 《春节与抗战宣传》,《新华日报》1940年2月9日,第1版。

7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224页。

-
- 8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22页。
- 9 《国际舆论：中国春节战云密布》，《实用英文半月刊》第4卷第4期，1938年，第8页。
- 10 丰一吟口述，周峥嵘撰稿：《丰一吟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 11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3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 12 《海南岛沿岸激战华军决坚守山地》，《申报》1939年2月18日，第3版。
- 13 参见胡兆荣《九架敌机作了点染春节的礼物：“二二〇”兰空初战别记》，《中国的空军》1939年第22期，第12页；李忠杰主编：《宁夏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180页。
- 14 岱峻：《发现李庄》，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 15 《蒋介石日记》，1939年2月1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 16 《蒋介石日记》，1941年1月2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 17 李文郑，陈竹编著：《春联趣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 18 叶惠芬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9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371页。
- 19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 20 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 21 章开沅：《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四），《江淮文史》2016年第4期，第55页。
- 22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页。
- 23 奚侗：《丁丑除夕怀五弟东曙》，《民族诗坛》第2卷第2辑，1938年，第17页。
- 24 老舍：《新禧！新禧！》，《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 25 张恨水：《除夕苦忆》，《张恨水全集》（散文集六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4页。
- 26 陈克文著，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20页。
- 27 林一厂著，李吉奎整理：《林一厂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03页。
- 28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
- 29 费正清、费维恺著,刘敬坤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6 页。
- 30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42 页。
- 31 陈克文著,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第 520 页。
- 32 杨兆龙:《我们的出路》,《经世》战时特刊 1938 年第 17 期,第 1 页。
- 33 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5 页。
- 34 《中宣部制定抗战春联》,《新教育旬刊》第 1 卷第 4 期,1938 年,第 49 页。
- 35 赖少其:《抗战门神》(彩色木刻),《良友》第 141 期,1939 年,第 28 页。
- 36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 19 页。
- 37 《关于派员参加废止春节举行春礼物劳军运动会议致重庆市政府的公函》,重庆市档案馆藏,0053-0013-00063-040-000。
- 38 《重庆市社会局关于发动春节劳军运动、节约消费并检发运动实施办法、宣传标语的训令》,重庆市档案馆藏,0144-0001-00014-00000-53000。
- 39 《努力春礼劳军运动》,《大公报》1940 年 1 月 30 日,第 2 版。
- 40 徐迈进:《扩大春礼劳军》,《新华日报》1940 年 2 月 10 日,第 2 版。
- 41 秦孝仪主编:《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二十九年工作概况》,《革命文献》第 101 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4 年版,第 343 页。
- 42 金功辉:《携手援义战: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众经济动员概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6 页。
- 43 《银钱图书等业献六十余万元》,《本报同人献一日所得》,《新华日报》1939 年 3 月 4 日,第 3 版。
- 44 《重庆市民热烈送礼代金礼品四十余万》,《新华日报》1940 年 2 月 11 日,第 2 版。
- 45 《慰劳总会订定出钱劳军竞赛办法》,《新华日报》1941 年 1 月 23 日,第 2 页。
- 46 《节费集捐请从春节起》,《新华日报》1938 年 1 月 31 日,第 1 版。
- 47 《关于抄发新年及春节节约办法的训令、布告、函》,重庆市档案馆藏,0053-0002-0000-109-000。
- 48 《为新年及春节节约告民众书》,《广东管价通讯》1943 年第 3 期,第 1 版。
- 49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会》,重庆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67-570 页。

50 王斌：《四川现代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4 页。

51 《校闻——除夕与元旦》，《大夏周报》1941 年第 17 卷第 4 期，第 5-8 页。

52[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 页。